

如何看待外译项目过程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调整

薛文涛 王梓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

摘要 | 袁园，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日语系主任，硕士生导师，夏威夷大学访问学者，《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编委以及多家国际期刊审稿人，多次应邀主持国际学术会议主旨论坛与发言。主要研究兴趣：话语分析。

关键词 | 中华学术外译；文化；意识形态；调整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薛文涛、王梓伊（以下简称薛、王）：袁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听说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问题与方法”成果已在东京出版，祝贺您！

袁园（以下简称袁）：谢谢，能顺利出版离不开团队、学院和学校的大力支持。

薛、王：袁老师，外译项目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和国家社科基金其他类别的项目有何区别呢？

袁：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设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举措，主要目的之一是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提升了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可以说入选外译书单的作品代表了中国学术最高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因此，和其他项目相比其文化和意识形态输出导向鲜明。

薛、王：原来如此。那么如何从书单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申报的著作呢？

袁：嗯，立项后很多老师来问过我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要回到外译项目设立的初衷和申报的初心。一是要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二是要判断译本语种是否急需。以我自身为例，从 2005 年在日本读研开始，到博士毕业回国工作一直从事话语分析领域，和本书的作者保持着学术上的交流。《文化话语研究》一书出版时，作者曾赠予我一本，可以说是该书的首批读者，对于内容比较熟悉。因为作者的主要著作基本是中英文，日本读者很难直接接触到本书的主要学术思想。同时，我发现日本读者在解读中国话语现象时，受到媒体等大众传播框架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偏见。因此，当这本书入围外译书单时，我联系了该书作者，征求了他的意见后决定申报。

薛、王：明白了，要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与专长，不能为了申报而申报。那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具体如何实现外译项目的文化走出去，或者说意识形态导向的目标呢？

袁：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外译项目本身

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导向，所以如何平衡读者理解与意识形态传播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也是团队最为谨慎的部分。首先必须对原作产生的背景、原作者写作目标、作品的内容以及学术影响力等了然于心，才能产出最为贴近原作的译本。

薛、王：能具体说说吗？

袁：嗯，其实我们的方法比较“笨”。虽然我对本书的内容、研究领域比较熟悉，但为更好地理解原著提出的文化话语研究理论，课题组收集了作者有关文化话语研究的重要论文、中英著作，采取文献综述的方法，研读并梳理了该体系的由来、主要框架、内涵、实现路径等，并积极与作者沟通、确认理解的正确与否。总结起来，就是“广泛阅读、积极沟通”。

薛、王：的确，只有在深入了解原作内容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推进翻译工作。那么能请您在此分享一下该作品的主要内容以及其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吗？

袁：好的。《文化话语研究：探索中国的理论、方法与问题》一书，201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获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作者施旭教授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众多著名国际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出版多部国际专著、编著。他的主要学术思想包括：话语（如政治话语、经济话语、外交话语、学术话语）应该作为不同文化相互竞争、相互渗透、相互合作、相互转化的社会现象来研究。作为一门前沿学科的西方“话语分析”已被介绍到我国社会科学的几乎各个领域。然而，其视角、理论、方法、价值取向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华文化的话语现实。本书最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在揭示了西方学术话语的文化霸权性质之后，提出一套既根植本土、又放眼世界的当代中国话语的研究范式，并以此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场域的话语进行了尝试性的诠释与评价。作者通过跨历史、跨文化、跨学科的路径，提出一套完整的哲学、理论、方法和问题系统：“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包括“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辩证统一”的认知观、“忧患/致用”的伦理观、“言不尽意”及“贵和尚中”的言语观、“全面多元”的方法观以及“和谐发展”的问题观）。为示范新框架的应用并展示当代中国的变迁，本书对“人权话语、贸易话语、城市话语、媒体话语”进行了实证解析和评价，

并提出话语体系发展和建设的战略与策略。

薛、王：袁老师，这样看来原作理论创新程度很高，我们如何认识本书在文化走出去上的学术价值呢？

袁：本书的学术价值简单而言是探索了一套当代中国话语的研究体系，即回答：在西方文化霸权的语境下，我国学者应该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研究体系，以帮助我国更好地认识自身的话语，也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话语。其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在于活跃于社会科学前沿的话语分析，源于西方传统，关乎西方需求。虽然有值得中华学术借鉴的地方，但是作为一种西方话语体系，不能套用于当代中国话语实践。

薛、王：我们是不是能这样理解，这本书为解决中国话语现象提供了理论体系，因此本书的外译意义在于为外国语读者提供了正确解读中国现象的话语框架，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袁：可以这样理解。文化话语研究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逐渐成形的一种知识运动、学术思潮和研究体系，已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从对外译介意义上看，全球化语境下迅速变革的中国，呼唤植根本土、放眼世界的新型研究模式。本书展现了一个话语研究中国化的方向和路径，让研习的学者和学生从中看到话语视角对于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作用，以及话语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必要性，具有较强学术价值和对外译介意义。同时，日本的学术界受到西方话语体系影响较大，对于中国的话语现象的解读存在较大误区，比如将中国部队提出的“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所以，我认为急需一套能帮助他们正确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理论工具。

薛、王：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正如您所指出的，西方话语体系不能套用于当代中国话语实践。那么，请问在翻译过程中如何保证准确的保证理论体系的精髓呢？

袁：该理论框架较为宏观，为了确保准确地把握理论体系的精髓，我们主要通过“做中学”的思路，在该理论框架指导下，尝试对日本媒体话语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撰写论文检测是否掌握该体系的操作路径。经过多次讨论，施旭教授认为我们团队精准把握了文化话语研究的核心内涵。在确保译稿质量上，

以忠于原著为基本准则。技术层面，课题组面临主要的难题是在“读者体验”与“忠于原著”的抉择上。在“话语分析”这一重要概念的译文确定上，按照话语研究的西方起源以及可读性上，理应译成外来语的“ディスコース・アナリシス”。但从原作“破除西方学术霸权，建构中国独创的话语研究理论体系”的学术宗旨出发，我们认为汉字的“谈话分析”更能体现原著思想，确立采用此用法。结合语言学的“超语”理论，字的呈现形式有超越意义本身的作用，比如日语片假名通常用在外来语中表示科技感，而日本人对于汉字的视觉认知更能联想起中国文化。

薛、王：正如您所提到的关于“读者体验”与“忠实原著”的翻译问题，我们观察到在译本中存在不少“译者注”，这是为什么呢？

袁：这点得益于评审专家的建议，通过“译者注”等方式，尽量弥补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全面解读。原作视角广阔，译文难免百密一疏。所以课题立项后，成员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并通过邮件等方式，对课题进度进行过程管理，及时总结翻译过程中的疑难点问题，做到及时与作者沟通，随时与课题组成员共享。通过组会的专业理论学习及时普及到全课题组成员。同时，考虑到某些概念对于日本读者缺乏语境背景知识，在翻译中通过“译者注”充实信息，力求读者能充分了解中国话语的核心，从翻译层面践行本书提倡的中国话语的普及。比如“和谐社会”，在文章中特别注明了概念提出者、内涵等。

薛、王：那么，您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该译作在日本出版后的反响吗？

袁：本书出版后，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关注，下面我节选一部分日本读者的反馈和大家分享。

20世紀後半からの英米を中心とする談話分析は、従来の「言葉／行為」といった言語学的な分割を乗り越え、人文社会の各領域に浸透する展開を見せてる。その中、批判的談話分析はディスコース分析を通して、テキストの中のパワー関係やイデオロギー、社会的不平等などを扱い、移民問題、人権問題を解決しようとする。だが、中国、日本の研究者にとって、西洋アカデミック・コミュニティが関心を持つ移民、人種主義問題という何となく遠い国の話のような印象がある。文化、哲学社会現象、関心も異なる一方、西洋理論の普遍

性に疑問を持つ。著者はこれらの談話分析理論から、冷やかな距離をとる。談話にまつわる人間の営みの本質は、文化にあると考え、談話に浸透している文化の働きを明確し、新しい考えかた、見方を示してくれることになる。著者は談話分析を用いて社会現象のメカリズムを解明する鍵も文化にあると主張し、中国文化の古層から、多分野の研究手法を横断し、文化に根したディスコース研究へ向かう手法を模索する。それによって、中国社会現象、問題を今までと違った見え方をするようになる。本書で文化的談話分析（カルチュラル・ディスコース・スタディー／CDS）というパラダイムを打ち立てる。中国現象は中国生まれのパラダイムでイミックな視点で読む。その意味で本書は、多様性と複雑性を持ち、中国現象を読むにも十分に有効な処方箋を提供する。また、この一冊は中国の社会問題をディスコース視点から迫った初の本格的な著作といつてよい。

薛、王：袁老师，我们翻译下。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主要在英国和美国的话语分析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言／行为”的语言学划分，并渗透到人文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批评性话语分析试图通过话语分析解决文本中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社会不平等，并解决移民和人权等问题。然而，对于中国和日本研究人而言，西方学术界感兴趣的移民和种族主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遥远的话题。文化、哲学社会现象和关注点不同，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作者与这些话语分析的理论保持着客观的距离。他认为人类话语活动的本质在于文化，他阐明了渗透在话语中的文化的运作方式，这将提供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察方式。作者认为，文化也是运用话语分析阐释社会现象机制的关键，并从中国文化的古老层次出发，跨越多个研究领域，探索出了以文化为基础的话语研究方法。这将导致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本书建立了文化话语分析的范式（Cultural Discourse Study/CDS）。用中国的理论解读中国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既多样又复杂的处方。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从话语角度探讨中国社会问题的严谨著作。

袁：翻译得不错。从日本学界的反馈可见，本书的译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

外译项目设立的目标，那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为解读中国现象提供有力的理论工具，帮助日本读者建立正确解读中国社会的思维框架。对此，全体成员都感到欣慰与骄傲。

薛、王：好的，感谢袁老师的分享。最后，能否请您谈谈在外译项目的申报以及最终译本的出版过程中，有哪些方面值得申报者注意的呢？

袁：在申报的过程中，立足本领域认真分析自己学术经历、研究所长与译本的适配性、客观评估组织协调能力是否能胜任译本的翻译和推介工作。在申报技术层面，虚心请教成功者经验也很重要。我们在申报过程中，曾受到我院朱红琼教授、社科部赖思源老师的手把手的指导，受益匪浅。立项后，认真严谨地对待译本，保持与作者、团队成员、项

目干系人的高效及时的沟通。最后，保持敬畏，反复斟酌，力求打造精品。其实，我们从初稿完成到出版，中间花费了2年时间打磨。并不是说我们不想早点结项，而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项目的初衷，原作者和出版社的信任让我们心存敬畏，慢工出细活，努力打造外译精品。我们团队也非常感谢学院、学校以及出版社的耐心，给予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完成本项目。

薛、王：好的，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进行本次的访谈。通过本次的访谈，不仅了解到了该书的核心思想与外译价值，还通过您的立项经历，引发了我们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再次感谢您的配合。

How to View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Adjustment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Translation Projects

Xue Wentao Wang Zi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Abstract: Yuan 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master instructor, is the dean of Japanese Department,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She was also a visiting scholar at University of Hawaii, and is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scourse Studies and reviewer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he has been invited to host forums and give speeches 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 Chinese academic translation project; Culture; Ideology; Adaptation